

◀（上接 3 版）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校注引言）》）第二，它并非一部长期酝酿、精心结撰之作，最初只是为同去欧游的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所作之序言，因下笔不能自休，字数长达七万，“篇幅几与原书埒”。当时随写随发表，最后哀然成书，虽自嘲“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仅仅用时半月，任公放纵笔墨，几近一挥而就，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我以为，此类以倚马可待的才情速成为“佳制”的急就章，其价值还不限于其系统性，而在于其中必包含了作者诸多“心得”或独到的“见识”——仿佛忽然得之的洞见。但其端绪也许早就深埋作者心中，不过偶然得几触发而已。恰如任公自述，早在 1902 年他已经写过：

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业，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不过，我在这里强调《清代学术概论》的那些创造性洞见，是承接着《欧游心影录》出离“沉醉西风”之后的宣言：《欧游心影录》预见一战之后，世界思潮即将大变。《清代学术概论》一开始就以思潮运动论清代学术史，他把汉代经学、唐代佛学、宋代理学和清代考据学分别都以“思潮”概括（这种以不同的思潮作为断代哲学史之纲领的写法，开了后来冯友兰先生撰写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先例）。清学的主流思潮是考据学，考据学又继之以今文学。整篇则贯穿了对于思潮、观念和人物的描述与评价，包括身与今文学之役的梁启超自己的思想及风格。因而可以将《清代学术概论》这样一个由于偶然的机缘而做出的作品，视为梁启超对于自己及其时代思潮的反思，进而去研究观念史，不单可以助人明了知识线索的联结，而且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史。就是如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所说，“即使经验主体相信‘顿悟’和‘设计’从他自己一个人身上‘灵感般地’‘突然一闪’地产生，它们仍然是从一个集体的基本设计中产生的，这个基本设计就存在他自己身上，尽管他没有通过自我反思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思想社会学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将这种集体设计——它仿佛只在个体的背后发挥着作用而不进入其反思意识——的水平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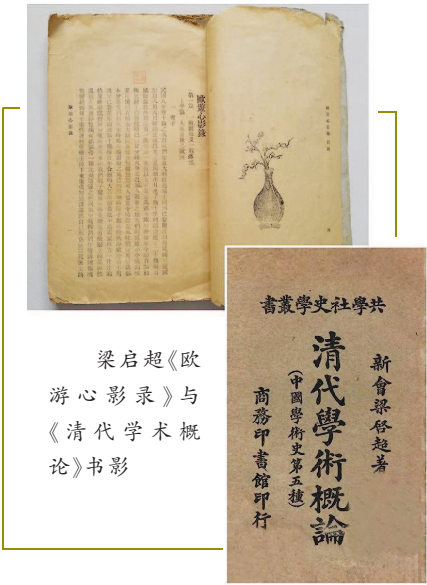
推进，并发掘出在一个时代或一种潮流中出现的离散の个体认识的深层背景。这就是重建。”（《保守主义》）

贯穿近现代中国最基本的“集体设计”或认识的“深层背景”是什么？以我之私见，是顽固地缠绕着国人的“古今中西”问题。迄今为止，任何宣告其最终结束的断言，都不过是另一场争论的开始。申明告别“沉醉西风”的梁任公，亦未能独自脱身逸去。

先说“东与西”。梁启超此书的写作缘起，本来是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做序言，但他不屑于泛泛而论，欲取中国与西方文艺复兴类似的时代互相印证，“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通过东西文化比较来认识中国自身，始终是那一代思想家的心结。跨文化的比较，比单纯倾心于西学自然进了一步。当初鼓吹变法维新的梁启超，在《时务报》上主张“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胥井以议天地矣。”（《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一册）1896 年更撰写《西学目录表》，认为“人方日日营吾侧，仟悉曲折，虚实毕见，而我犹枵然自大，偃然高卧，匪直不能知敌，亦且昧于自知，坐见侵陵，固其宜也”。所以主张“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西学书目表系例》）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回顾近代以来通过翻译而来的新思想传播史，认为除了严译名著卓有成效以外，大多是途经日本转译而来，虽然一度如火如荼，“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贪多务得、不成章法。最意味的却是，梁启超一边出离“沉醉西风”，一边依然认为中国人西书译得不够，责备大批昔日身披“西风”的学人未尽反哺国家之责：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负有负于国家也。

对于一百年来对西方著述的翻译介绍及其后果，国人的意见并不一致，以严苛的眼光视之，以为它与中国学术丧失主体性有牵连，譬如应该对固有学术在语文学上变成“汉话胡说”负一点责任。研究中国近代术语起源的历史学家则持论



宽厚，承认“由于中日两国在近代创制新词，是为着对译西洋术语，故近代新语是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积极回应、彼此推引、双向传播的产物。更确切地说，近代新语是汉字文化在中、西、日三边互动进程中的创造性结晶。”（冯天瑜《新语探源》）回看当日之梁启超，他固然对中国文化有着坚固的自信，尤其相信中国不会灭亡，不惟不亡，而且对于世界的未来负有极大的责任。故还是需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扩充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在世界文明与永久和平的乌托邦鼓舞下，梁启超自然期望有认真、全面而系统的翻译介绍西学的工作。直至 1920 年，他依然说：

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鹵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不止于此。以其本人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以“新思想界之陈涉”自名，说明对于昔日所为——其价值主要在“破”——梁启超并无悔意。不过，时至 1920 年，他转而发愿“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要从事思想文化的建设性工作了。

再说“古”与“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凸显的主题是其

变奏：“解放”与“复古”。“复古”毋需多言，“人的解放”或者“思想解放”则是近现代的主题。梁启超此书前，有《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上篇谈战后之欧洲，主体是描述欧洲破败相状；下篇是“中国人之自觉”。其中第六节专论“思想解放”：

无论什么人向我说甚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

当运用思想时，决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经此以想，觉得对我便信，觉得不对我便反抗。“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是韩昌黎极无聊的一句话。

挑明了，此处的“思想解放”，就是中文版的康德启蒙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朝前追溯，把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等视为清学“启蒙期”的代表。进而又把启蒙历史化：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

仔细看过來，整个清代学术的调性被确定在“以复古为解放”，意味着梁启超不仅把清学的主脉视为向“轴心期”的回归，以迂回为进步，先凭圣学之名以自保，再行挑战陈说权威之实，而且最终似乎导向为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作辩护了。

说梁启超为新文化运动辩护，不等于说他赞成吴虞、陈独秀辈的激烈言论；但是以“思想解放”为旗帜，却与新文化运动同调。平心而论，事关“除心奴”，20 世纪初的梁启超早就发出了激烈之先声。在《新民说》中已经说过：“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骄傲地回顾，当初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康有为退出历史舞台中心已久，查《年谱》记载，梁启超此时偶与之交往，仍以师礼待之。但在回顾那段公案时，梁启超并不含糊，大段引用当初《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中驳斥康有为的文字：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诸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餽遗我国民也。故吾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

这段出现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文字，先后分别见诸《饮冰室文集之九》和《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朱维铮先生在编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时，已经指出《清代学术概论》所引之文字实有所删节。其初衷未改：赞成自由创造可以导致中国思想学术繁荣的主张并无变化。梁启超当然对孔子抱有敬意，当初也说过“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那样的颂辞（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此句被删）。但他坚决拒绝走保教一类遏制国民思想创造力的老路，因而继续对旧式士人的思维方式大加挞伐：“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和‘名实混淆’。”两千年的经学都披着孔子的华衮，凡有所创造必附丽于“经”之引用与注解而后可。“此病根不除，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

梁启超的一大可爱之处是有自知之明且异常坦白，他说自己“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贪多务得，前后矛盾，不注重理论的自洽性，决定了梁启超难以进入近代体系性哲学家之林。但是，作为一个发挥过领导作用的前驱者，在其多变之中自有不变的精神在：他已经超越经学时代的局限，坚持中国学术应该扬弃自缚于注经之方式，学者宜努力保持其独立和个性，并且继续以开放的态度看待世界，才能使得传统的思想文化获得创造性发展。这使我们想起章学诚的一段话：“学问文章，聪明才辩，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说林》）用它来品评出离“沉醉西风”之后的梁启超，虽不中亦不远矣。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